



旧时上海茶楼大都附有点心摊,其中多数是生煎包子,也有蟹壳黄。罗春阁是茶楼,开设在浙江路上,坐东朝西,稍北是牛庄路,离更新舞台(后更名为中国大戏院)很近。

罗春阁的生煎馒头在旧上海是顶级名小吃,质量水准永保不变,而今有些名小吃消失了,还尚未消失的也会是开始稍好一阵,待有点名气就走样了(为免引来麻烦恕不点名了)。某天老伴从著名景点买来袋装的传统小吃,我尝了一口立马吐掉:“这哪里是xxx的双档?”

我对罗春阁的生煎,当年无能力消

## 罗春阁生煎

贺友直 图/文

受,只是当学徒时常路过那里,闻到香味会停下脚步看师傅操作,我不知它的原料如何,但看了它对火候的掌控,那时的炉子是烧煤的,鼓风用的是手拉风箱,徒弟是看师父的神色锅里冒的气来掌握拉动风箱的力度及速度的,所以出锅生煎的底肚是黄脆,哪像如今使用的是煤气或电炉,只为图快自始至终调控在猛火档,以致煎出馒头的底肚焦而硬,像我这档老人入口硬咬崩掉牙硬咽哽喉咙。看到这档东西只会倒胃口。



走街穿巷 忆旧事

## 快乐就在身边

去深圳出差,傍晚到大梅沙海滩散步,远远望去,海面上波涛起伏,一波波海浪退去又向岸边涌来,激起冲天浪花。宽阔的海滩上聚集了很多人,有的在观海,有的在浪中击水,更多的人赤着脚,站在海滩边,享受着海水的摩挲和冲击。忽然,耳旁传来一阵朗朗的笑声,扭头望去只见几个姑娘正挽着裤脚,手拉手站成一排,让海浪冲击。其中一个穿着鞋子的同伴远远站着不肯下去,她们硬是把她们拉来站在一起,正好一波海浪迎面扑来,把姑娘裤脚、鞋子全冲湿了。于是,大家开心地笑着,追闹在一起。

我怔怔地看着,被姑娘们的快乐所感染,也试着走下海滩。海浪又一次涌来,溅得人们欢笑着四下跑散。我蓦然发现,原来快乐就在身边。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内蒙古高原的一个旷野上,那是深秋的傍晚,刚刚从炮阵地上下来的我,突然望见一群迁徙的鸟群,在高远的天空上,在夕阳橙色的背景下,一群群从北方涌现,在高空的气流中,旋转着,一路叫着,缓缓地向前推进。如此壮观的鸟类迁徙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,我不知道这是些什么鸟,只感到一股快乐在心底流淌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这样清澈透明、从心底溢出的快乐已经久违了。在生活的每一个日子里,我们都在寻找快乐,可快乐总是时隐时现,若即若离。其实,快乐无处不在,只是被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所掩藏,麻木了我们感知的心。我们不是经常被外界的干扰丢掉了快乐,就是因无止的欲望,企图抓住一切而恰恰放飞了快乐。

快乐不仅需要去发现,也要善于营造。我居住的小区,在每天的早晚,都能见到一位身穿黄马甲、臂戴红袖章,大约50多岁的阿姨,站在垃圾房旁,对垃圾进行分类管理。她始终笑容满面,非常开心的样子,常自备一副钳子,一边指导着居民对垃圾的投放,一边分拣着一些不正确置放的垃圾。没有人来的时候,她会拿出收音机,坐在小马扎上,听听音乐,或唱唱歌,有时站起来扭几个舞步。一个枯燥乏味的岗位,就这样被她营造得其乐融融,快乐无比。

看来快乐真的很简单,关键是否拥有一颗快乐的心。人生路上各有各的风景,知足才能常乐。如果我们以清朗和坦然的心态去面对现实、面对生活,多想想眼前拥有的,少些抱怨、少些攀比、少些欲望,也许快乐就会伴随你身旁。有时,一个微笑、一句问候、一阵风雨、一场球赛,都会让你如沐春风、兴奋不已。正如庚澄庆在《快乐颂》里唱道:“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,告诉你,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……”



走街穿巷 忆旧事

人的器官中,眼可欣赏他山之景,耳可聆听异域之乐,唯独胃,最为眷恋本土。一个人自小爱吃什么,到老了还是爱吃什么。西晋张翰不爱官位爱莼鲈,成为有名的思乡掌故。郑板桥嗜好狗肉,李鸿章爱吃咸菜,鲁迅喜欢清蒸鲫鱼,包玉刚独好宁波臭冬瓜。每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游子,差不多都有对家乡菜的浓浓思念。所谓的乡愁、乡恋、乡情,通常包含家乡菜在内。有华侨说,胃最爱国,确实。

## 上海,饮食之都

熊月之

老上海五方杂处,中外混处,各地移民将各地饮食习惯带到上海,形成了各帮菜系汇聚一地的恢弘局面,粤、潮、闽、徽、苏、杭、甬、锡、镇、扬、京、川,加上本帮、清真,还有被习称为“大菜”的西餐,应有尽有。从岭南到燕北,从沿海到内地,无论什么地方的人来到上海,都能品尝到家乡菜。各种菜系的饭店菜馆,都有高、中、低不同档次,以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。

近代上海城市重心是由南市逐渐向北移动的,饭店的分布也随此趋势而移动。大体而言,开埠前后到19世纪60年代,饭店主要分布在城厢内外。19世纪60年代以后移至广东路,19世纪80年代集中在广东路与福州路,民国初年扩展到在广东路、福州路、汉口路、四川路、法国大马路(今金陵东路),20世纪40年代后期更扩展到静安寺路(南京西路)、爱多亚路(延安中路)等处。

除了成规模的饭店、菜馆、酒店,还有散处于大街小巷的面馆、点心店、粥店、糕团店、熟食店,品类繁杂,随处可见。据统计,1930年,仅上海市政府辖区内(不包括公共租界与法租界),取得营业执照的各类饮食店就有8387家,包括饭店821家,面馆936家,点心店615家,大饼店2090家,粥店243家,冷食店586家。其时城市主体部分在租界,两租界的饮食店一定远远多于华界。所以,保守一点估计,1930年全上海饮食店至少有两万家。30年代至40年代末,上海人口由三百多万增加到五百多万,餐饮场所也随之增加了许多。1949年以后,虽然经过公私合营,不少小饭店、点心店有所归并,但大多数老饭店、名菜馆仍延续传统,久盛不衰。贺友直老先生提到的洁而精是1937年开设的著名川菜馆,小常州排骨年糕、罗春阁生煎、满庭芳臭豆腐、南阳路上的私家饭店,则都是继承传统的特色点心小店。老上海此类特色点心小店为数甚多,我曾让学生以《饭店与近代上海社会(1843-1949)》为题,做过一篇博士论文,对此有过系统研究。看过那篇论文,你会情不自禁地赞叹:上海,饮食之都!

每一个人的总希望简简单单地生活,安静地看看小说、听听歌。

## 开始的时候

徐长顺

开始的时候,什么都不知道,不知道有风不知道有雨。有一天,知道了风,也知道了雨。知道了下雨时,刮风时,路不好走。知道了勇敢,知道了坚持。知道一个人,一生中,会遇到许许多多黑色的日子,没有阳光,没有月光,路在哪里,无法知道。这时候,只知道活着很累。其实,可以不累的。其实,都想活得轻松。

买下我家这屋,除了屋子本身,我还喜欢篱笆外的大公园和篱笆内的柠檬树。想象一下,傍晚归来,躺在后院,闻柠檬的清香,望公园远处枫叶、杨柳、古树,自是情趣无穷。

我家隔壁住一个澳大利亚老头,六十多岁,因为工伤,残了条腿,得了笔赔偿,十几年前买下隔壁那幢屋。老头有几大爱好。一是喝酒,成天酒气熏人,倒垃圾的每星期都能从他家门口搬走成袋成箱空啤酒罐。二是说粗口。接下来的爱好,就是关心我家的柠檬树。

开始,大约二三期,他来敲一次门,后来成了一二星期;开始来时,他手里拿的是小号塑料袋,后来改成了大号,再后来一次,开出门去,只见他一腿站着,一腿踮着,一手撑着门框,另一手夹着个装水果的纸皮箱。

我愣了愣:“你……这是……”

“咳——咳——”他清痰似的笑几笑,很大度地说:“别担心,别担心,不用装满的。”

我说:“黄的没了,都摘光了。”

他骂了句脏话:“我不需要黄的,青的一样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那你自己去摘吧。”

他去了,毫不客气,一会儿,装了满满一大箱,而后,拖一条跛腿,一摇一晃地走了。

我回后院一看,没了,全没了,

## 我家的柠檬树

黄惟群

连半黄的都没了,只剩几个绿色的小小的圆,藏在树叶中,看也看不见。太过分了!问人要东西竟这般理直气壮、无休无止。我开始怀疑是否自己对澳大利亚了解太少,怀疑这棵树的契约会不会是他的?又觉得可笑:世上哪有这种事!

我糊涂了,真的糊涂了。轮到我摘柠檬时,竟像去偷,心都跳起来。有时,开车回家,远远的,隐约望见树上显出几团金黄,我的心会不自觉“咯噔”一下:糟了,又到他来敲门的时候了。我甚至有过一个荒唐的想法,要用一块布,把整棵大树严严实实包起来……

春来夏去,秋来冬去,我想躺在后院里,闻自己家柠檬清香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。澳大利亚的美妙,家园的宁静,全被他破坏了。

不行,不能这样下去,这不仅仅是关系几个柠檬的问题,得彻底解决这件事。我准备了几天台词,待到他又来,我对他说:

“对不起,我不能给你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的朋友问我要,我得等它们长黄。”说了,我即刻后悔,干吗提黄不黄的。

我知道程乃珊,是1983年在《钟山》上读了她的《蓝屋》。从此,我永远记住了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。因为,这个中篇与我的出生地有着很远又很近的关系。

读着这部小说,我感到这座“蓝屋”慢慢在我眼前显现,尽管故事和人物都不熟悉,但房子绝对是真实的。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觉,以前从未有过。“蓝屋”——“绿房子”,线路突然接通,我当时便自以为是地确认,蓝屋就是绿房子。作家一定是从绿房子的史事变迁得到灵感,进行创作的。我想,有机会一定要拜访程乃珊,证实我的猜想。

我是上海土著,祖居的老屋位于四平路(靠近那时一条叫全家庵路的小路口)夏家宅,我母亲的娘家,就在旁边的杨家浜。1937年八一三事变,侵华日寇在虹口天通庵车站开枪挑衅,制造事端。我家老屋离天通庵不远,无法安居,只得逃难到租界,暂住爱文义路(北京西路)铜仁路口的一条小弄堂里。我就是在逃难期间生于租界的。这条弄堂不长,有几幢二层砖楼,房型好像不大规整。底楼有中华书局的一个装订车间。我人生最早的记忆,就是同小伙伴蹲在切纸机下玩土。可能因为在打仗,不记得有工人上班,车间里用木板搭了一个比教室讲台大的“防空洞”,估计不能“防空”,我们这样的幼童倒可以用来捉迷藏。

这要说到“绿房子”了。我们那个小弄堂东侧,靠铜仁路转角上,盖了一幢非常漂亮的花园洋房,绿色瓷砖贴面,四层楼,带电梯(据说这是上海住宅的第一梯),楼角呈圆形,还有像船舱那样的圆窗,楼前有网球场。我那时太小,对这房子的印象是后来慢慢形成的,包括长大后几次路过那里。现在房子还在,我脑海中的影像如果有误,大家可以用实物校正。当时的设计者对业主吴同文说:“我可以向你保证,这房子再过50年,也是最现代的。”这话基本不虚。1938年房屋落成,轰动一时,被媒体称为“远东第一豪宅”,远近的人都把这楼叫作“绿房子”。

“绿房子”岁数比我略大。据我小姨(姑姑)回忆,吴家搬入新居时,大宴宾客,铜仁路一侧停了许多小汽车,盛况空前。在我零星的“史前”记忆中,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吴宅院内飞到我们弄堂里的网球,他们从来不出来捡,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你想,在那年月,我还不知道小皮球为何物时,已经玩上了网球,这“先进性”恐怕超过今天的小孩玩遥控汽车!

抗战胜利后,我家搬回虹口,叔父住回老屋,家父租住不远的山阴路,直至我完成学业,远离家乡。我的根在夏家宅,我的出生地在北京西路。我幼时度过逃难岁月的的那个弄堂,已经换了新颜,只有“绿房子”依然屹立——它成了我人生起点的地标性建筑!

1985年3月,我和天津几位朋友去厦门开会,必须在上海转机。正好有一位《天津日报》记者要去采访程乃珊,我便同行。那年一月,《文学报》发表了冯骥才与我关于《神鞭》的通信,程乃珊还有印象,说我的文字像个老先生写的(那时我还不能称“老”)。我便接过话头抢先提问:《蓝屋》的生活原型是绿房子吗?程乃珊答道:“是的,在铜仁路。”得到肯定的回答,我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。“绿房子”于我有意义吗?其实是有的,我朦胧的记忆中那两扇深绿色的大铁门,我从来没有进去过。现在“绿房子”进了一部文学作品,勾起我生命之初的回忆,我的祖母、

我的父母,还有我至今还健在的姑妈,我生命中所有依傍过的亲人,有这个起点,都穿起来了。你这下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对《蓝屋》追根问底,为什么从此我把程乃珊看成我们这些身在外地的老上海的娘家姊妹——我喜欢她关于上海的小说与散文。

上海是我们的根,根本不是抽象的,它也要有所依傍。作为一个文学教师,我感谢程乃珊用她的作品给了我这样的依傍。

纸上郭索,易思朵颐,妻恰端面汤进屋,更添茶香,谓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,香何来?茶香耳!友常责余应多陪夫人,奈痼疾难改,夜不读书,犹如沙漠行走,心无着落。妻病入院,夫当值夜,读书竟忘输液已尽,连连向妻致敬,妻慰之。妻之贤,胜于书!

在练习跑步的过程中,结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跑友。

## 十日谈

生活小记



夜光杯